

大眾傳播與國族認同：

從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

一、 研究源起

自從英國學者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 1983 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將近代民族國家的源起與 16 世紀開始興起的印刷資本主義（十八世紀之後經常以報紙的形式呈現）密切關聯之後，大眾傳播在現代國家的國族認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說法幾成定論。¹安德森在他這本已經成為經典的歷史社會學名著中，把近代民族國家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吳叡人，1999，頁 9）。如果要以極簡單的方式來說明安德森的論證，大概可以進行以下這樣的描述：「近代民族國家這一『想像共同體』，作為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其出現的背景條件包括：『世俗的線性時間，取代了神聖的共時性』此一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過程當中的一次深刻變化；加上『印刷科技、資本主義，以及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歷史因素間，半偶然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吳叡人，1999，頁 x i - x ii）

安德森指出，閱讀報紙這種「極端形式」的書籍（單日的暢銷書），彷彿現代人每天進行的共同儀式，在同一時間被千千萬萬彼此不認識的人一起進行，他們彼此毫不相識，但卻確信彼此都同時進行著同一件事，這個儀式每隔一天或半天就進行一次（作者按：網路時代，可能更為密集），再沒有比這更生動的想像共同體的形象了。而當報紙的讀者看到與自己所閱讀的同一份報紙也在地鐵、理髮廳、或者鄰居家被閱讀時，他更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就根植於日常生活當中（吳叡人，1999，頁 36）。

而其實在安德森提出他的歷史社會學理論之前，傳播發展論的先驅學者如勒納（Daniel Lerner），從觀察 1950 年代中東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也發現，大眾傳播媒體是二次大戰之後，中東地區從傳統部落社會轉型為現代化都市型態社會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大眾傳播媒體在「同理心」（empathy）的養成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Lerner，1963，頁 47-52）。傳播發展論學派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對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具有社會守望、決策溝通、教育傳承的重要功能（Schramm，1964，頁 127-144），該學派在功能論典範下的理論立場²，與安德森的歷史社會

¹ 本文所使用「國族認同」係包含「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因為根據安德森對近代民族國家起源的看法，「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本是一互為表裏的相互建構過程（Anderson，1999）。

² 結構功能論是社會學主要的理論典範之一，由帕森斯（Talocct Parsons，1902-1979）所提出，主張從所具備之整合、維繫社會體系之功能的角度，來看待各種社會行動，並提出著名的「AGIL 理論」（AGIL 是適應-Adaptation，目標取得-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潛存-Latency 四個英文字縮寫的縮寫）（蔡明璋譯，1990）。Parsons 的「結構功能論」在 1950 年代曾一度成為美國社

學立場不盡相同，但都強調大眾傳播與集體認同間的密切關係。

雖然不像安德森般直接明瞭的指明印刷資本主義（報紙）的關鍵地位，但曾經注意到大眾傳播媒體對民族主義或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影響的，還包括尤金·韋伯（Eugen Weber）在《農民變成法國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一書中所指陳的，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受教育有限的法國鄉間農民，透過閱讀報紙，充實了他們有限的字彙，並開始能夠進行跨越地域的公共事務想像與抽象思考（Weber，1976，頁 469-470）；柯理（Linda Colley）在《英國人》（*Britons*）一書中則描述，相較於法國人要到十八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才看得到每日出刊的報紙，倫敦人在 1730 年代已經有六家日報，外加好幾種每三周發行的雜誌可以閱讀。而到十八世紀末，英國各省分共有五十家不同的報紙，蘇格蘭則有九家報紙，在坊間也可買到以月刊方式發行的《蘇格蘭雜誌》（*Scots Magazine*）。柯理指出，雖然大部分的時候人們閱報是基於搜集廣告訊息、八卦娛樂等私人理由，但除了地方消息，由於這些地區性報紙都會大量轉載倫敦報紙中英國國會的各種辯論議題、戰爭（或議和）消息、全國股市商情，以及最新市井閒話等等，讓讀者更容易了解英國境內的各個地區及其不同的文化（Colley，2003，頁 41）。另外，通俗戲劇也是大眾傳播的重要形式，莎士比亞的多部劇作就被學者視為是形塑早期英國國民意識的重要作品（張洋培，2006，頁 360-362）。

如同英國史學巨擘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被發明的傳統》一書的導論中所指出，人類社會中有些所謂的「傳統」其實是人為創造的，當社會產生劇變，因此削弱或摧毀了舊傳統的社會模式，或當舊傳統及其制度的媒介者與傳播者不再能適應和變通，人們就會期待新傳統的出現。為了創造新的傳統，舊史料會被重新組合運用，讓新傳統與舊事物輕易地接合。而在各種被創制的傳統當中「民族國家」的相關系列可說是集其大成，也就是和「民族」相關的許多現象，包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民族象徵、民族史等等。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就都是在當代時空中被新創的，否則難以解釋為兩者間的領土紛爭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幾乎不存在（Hobsbawm，1983，頁 4-14）。霍布斯邦指出，民族主義的相關論述往往強調民族源自「很久很久以前」，實際上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同上，頁 14）。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他更直接闡明：「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立，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1990，頁 10）對一個身處台灣社會的研究者而言，所感興趣的是：有關近現代民族國家這種「被發明的傳統」的討論，對當代台灣社會的自我理解具有怎樣的啟發性？它與大眾傳播媒體之間又有怎樣的關聯？本文將從近代中國與台灣新聞史的角度嘗試提出一些說明。

二、 近世中國的報業與國族想像

會學研究的顯學，而傳播發展學派也大約在相同時期發展出來，其對大眾傳播採取有助於社會整合的功能論立場應非巧合。

近代意義下的報紙開始以中文在華人世界刊印發行，與西方人的傳教及商務活動脫不了關係。³著名的上海《申報》在 1872 年由英國商人美查 (Ernest Major) 所創，雖標榜「華人之耳目」但言論方向基本上仍以西方人之利益為依歸 (方漢奇，1981，頁 41-48)。1874 年 (同治十二年) 王韜在香港創立《循環日報》，則是華人辦中文報最早的成功例子。⁴《循環日報》強調「華人資本、華人操權」(卓南生，1998，頁 216-220)，或可視為「民族報業」的伊始。1894 甲午戰敗後，有識之士驚覺國亡無日 (賴光臨，1980，頁 1)，此後中國境內之報紙接踵而起，或倡議維新、或昌言革命，「一時報紙，興也勃焉。」(戈公振，1982，頁 145-153)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已被西方強權們步步進逼，又遭晚近崛起的日、俄兩鄰國日夜覬覦的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要脫離最後一個王朝---滿清王朝---的統治，曾透過報刊大力鼓吹排滿思想。鄒容的《革命軍》、章炳麟 (太炎) 在《蘇報》上的議論文章，⁵無不充滿推翻異族統治的排滿思想，相較於康梁提倡變法維新，跳脫種族之辨、只論君主立憲制度改革的保皇論，這種在民族論述上的激進態度與孫中山的革命路線更具有親近性。⁶無怪乎其所組織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要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革命宣傳口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人類社會區別我群與他者最古老，也是最簡單直接的方式，「興中會」就曾經將記載清朝初年清軍屠殺漢人的〈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記〉，以及明末遺老顧炎武《明夷待訪錄》中抗拒異族統治的〈原君〉、〈原臣〉等論述做為宣傳品散發 (林明德、黃福慶，1982，頁 330)。學者戈公振即認為：「清廷之兼政者，既無悔禍之心，又復顯滿漢之界線，以激發人民種族之痛苦。卒之此說易入漢人之心，直截了當，終睹辛亥之成功。」(戈公振，1982，頁 235-236)

辛亥革命前一年 (1910) 秋天，力主革命的于右任在上海創辦《民立報》，

³ 雖然有學者主張中國在古代就有「邸報」、「京報」的印行 (戈公振，1982；陳聖士，1989)，但其性質比較接近政府公報。最早在華人社會出現的類似近代意義的中文報刊，是 1815 年由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在馬來半島麻六甲所發行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月刊 (戈公振，1982，頁 87)，主要目的是傳教，但亦兼及新聞及新知 (同上，頁 91)。因此戈公振才會說：「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人之手。」(同上，頁 87) 在中國境內出現的第一份報紙，則是 1833 年德國傳教士郭實獵 (Charles Gutzlaff) 在廣州發行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月刊 (卓南生，1998，頁 55)。

⁴ 艾小梅 1973 在漢口辦的《昭文新報》比《循環日報》還早，但銷路不廣，不久即停刊 (戈公振，1982，頁 153)。

⁵ 《蘇報》創於光緒二十三年 (另一說二十二年)，係胡鐵梅以日本妻子生駒悅名義在上海日本總領事館註冊。後由曾任江西知縣，原主張保皇，繼轉向革命的陳夢坡出資購買。學者周佳榮對此經過做過一些考證 (周佳榮，2005，頁 11-13)。根據周佳榮的研究，蘇報從原本主張立憲、保皇到積極主張排滿、革命，與當時上海蜂擁的學潮有關 (同上，頁 11-66)。當時由吳稚暉、章炳麟、蔡元培等人所組織的「光復會」透過《蘇報》鼓吹革命主張。章炳麟為鄒容的《革命軍》寫序 (戈公振，1982，頁 206-209)，《蘇報》則在新書介紹欄目中大力推薦此書：「其宗旨專在驅逐滿清，光復中國，筆極銳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於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戈公振，1982，頁 213-214)

⁶ 康梁主張以是否接納儒家文化來判定「中國」的界線，1899 年到 1902 年間，師徒二人大倡「孔子紀年」，認為西方基督教世界以教主耶穌的生年為曆法元年，中國既為儒教國家，自然應以「教主」孔子生年為曆法元年。但革命黨人劉師培則在 1903 年提出「黃帝紀年」，指出黃帝為漢族之鼻祖，炎黃子孫自應以其降生之年為國史之始 (沈松橋，1997)。雖然最後都未被社會採納，但立憲派與革命派在「創制傳統」上的激烈競爭可見一斑。

于右任在發刊詞中直指：「是以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使能發生獨立之言論。再推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獨立之民族；有獨立之民族，始能衛其獨立之國家。言論也、民族也，相依為命；此傷則彼虧，彼傾則此不能獨立者也。」（于右任，1981，頁 345）在于右任的這篇論述中，把民族、國家、言論三者之間做了緊密的聯繫，顯示在滿清王朝壽終正寢的前夕，中國的報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站好近代民族國家鼓吹者的位置。甲午戰敗後報刊蜂起，而「武昌起義、全國景從，報紙鼓吹之功，不可沒也。」（戈公振，1982，頁 237）但在清末革命情勢下波濤洶湧的滿漢對立的種族主義立場，在滿清王朝被推翻後，卻很快被「五族共和」的新口號給取代，顯示其在政治動員上階段性、工具性的作用，⁷也可以看成是在當時革命激盪的年代下，透過文字印刷媒體刊載的論述，所營造出來的一種被創制的傳統。

與老師康有為一起主張變法維新的梁啟超，其政治主張雖未能實現，⁸但他先後投入《中外公報》、《實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政論報》、《國風報》、《庸言報》等報刊的編撰（賴光臨，1980，頁 24-69）。堪稱清末民初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報人。梁啟超充分理解報紙做為大眾傳播媒體，對凝聚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幅員之「想像共同體」的重要性。他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指出：「觀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莫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越之與中原，邈若異域。……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轉引自賴光臨，1980，頁 13）在梁氏扮演要角的諸多報刊中，《新民叢報》存續最長（1902 年至 1907 年，前後共五年多），發行最廣，該報在發刊宗旨中倡言：「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我國家思想……」（轉引自賴光臨，1980，頁 38）。在政治上不主張滿漢對立，梁啟超認為報紙的論述是為了培養讀者的「國家思想」，他筆下的「國家」，基本上是超越種族界線的，指涉當時清朝統治下，境內包含各種民族的中國。推翻了滿清王朝，是為建立憲政共和，但現實狀況卻是，清朝亡覆後，中國幾乎立刻陷入了軍閥割據與政治上的分崩離析。

民國成立之後，中國境內報刊從 1911 年的九十種暴增到兩百七十種（賴光臨，1980，頁 7）。政黨、政治人物紛紛以報刊為言論機關，知識分子也以辦報實踐救國理想，但言論若得罪當道，報刊動輒遭封禁，⁹報人被殺時有所聞。¹⁰其

⁷ 歷史學者朱法源即主張，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所鼓吹的「民族革命論」，言論內容雖非常激進，但主要是為了推翻反清的政治目的，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從民國成立之後，「五族共和論」立刻取而代之，可見一斑（朱法源，1995，頁 47-93）。

⁸ 梁啟超原本傾向革命，但 1903 年後被康有為說服改倡變法，削弱了他在輿論界的影響力（賴光臨，1980，頁 3-4）。

⁹ 恢復帝制曇花一現的袁世凱曾大肆查禁批評、反對他的報刊或用金錢收買，或用法律箝制，或禁止出售與郵遞，甚至封報館捉人（賴光臨，1981，頁 19-25）；張勳復辟，十二天內封了十四家批評他的北京報館（同上，頁 49）；袁世凱死後出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因為報紙批評他對日本鉅額借款，曾一口氣封了八家報紙（同上，頁 50）。

¹⁰ 著名報人被殺的事件包括：1913 年《民立報》的宋教仁被袁世凱買兇殺害於上海車站（賴光臨，

中重量級的報紙如天津《大公報》，¹¹從 1902 年創刊到 1931 年發行滿一萬號時，主筆張季鸞在〈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1931 年 5 月 22 日刊出）中指出：「然民國以來，其實質未變，欲變而欲烈者，則民生愈困苦……民國十數年所增加者，徒為若干軍閥買辦與無數遊民盜匪……是以三十年來，本社前後同仁之苦痛煩悶，同時即為四萬萬同胞共同的苦痛煩悶，今猶有待於掙扎奮鬥者也。近代國家，報紙負重要使命，而在改革過渡時代之國家尤為重要。中國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論報國之風，自甲午後而大興，至庚子後而極盛。」（張季鸞，1979，頁 63）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境內實際上雖然是國共對立、將帥分權，但大公報心目中的讀者，顯然是張季鸞筆下的中國「四萬萬同胞」的國族想像，並沒有華夷滿漢之別。¹²

張季鸞是近代中國極為重要的一位報人，透過他擔任主筆的《大公報》，每每在關鍵歷史時刻寫出主導當時輿論方向的重量級評論。1926 年 9 月 4 日由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剛攻下武漢，張季鸞發表〈回頭是岸〉一文，同時規勸火力仍居優勢的北方軍人在「北洋正統」已失的情況下，不如與具有孫中山之主義目標的南方革命軍合作；而南方蔣介石力量亦不應對黨內的左派力量「動輒目為紅軍」、「一若仇敵外患」。他以愛國心勸和南北，提到民國建立已十五年，但十五年來：「南北健兒死於內戰者，不知幾十百萬人。生靈塗炭，更達極點。卒之皆愛國結果禍國。皆無賣國之心，而國權步步斷送於大家之手。夫無論黨不黨，皆中國人耳。」¹³張季鸞此文以南北統一，左右共治為前提，呼籲各方力量相互合作不要再兵戎相見。從上面引述的這些重要報章文字中所透露出的，應該具相當代表性的國族想像可以看出，雖然自民國以降，中國在政治事實上一直處於分裂狀態，境內民族眾多、語言分歧，但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卻依然延續梁啟超筆下的國族想像，仍把繼承滿清疆域的整個幅員視為同一個國家。這似乎印證了：國族想像不必然呼應於現實政治或民族血緣現況，而是相當程度反映某種主觀期望，與現實狀況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對獨立性。

三、台灣在特殊歷史脈絡下塑造的國族想像

1981，頁 28）；1914 年袁世凱又殺范鴻仙，1926 年張作霖殺邵飄萍、張宗昌殺林白水，1934 年蔣介石殺史量才（李文綸，1999，頁 106-128）。

¹¹《大公報》於 1902 年庚子義和團事變後由滿人英欽之所創，民國以後由早期出資人王祝三接辦，但報務漸衰。1926 年吳達詮（社長）、胡政之（經理）、張季鸞（編務）三人共同接辦該報，開創了該報的巔峰時期。尤其張季鸞在西安事變以及中日戰爭爆發等重要歷史時刻為《大公報》所寫的幾篇社論，被認為是主導當時輿論氣候的指標，對時局發展影響極大（賴光臨，1981，頁 118）。

1941 年《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選為「年度最佳外國報紙」（賴光臨，1981，頁 116）。

¹²《大公報》的創辦者英欽之本身就是個滿人。英欽之為知名軍事家英千里之父，雖為滿人，但在辛亥命前《大公報》的政治立場卻是「民主派」，與當時對手報《天津日日新聞》的「君憲派」互別苗頭（戈公振，1982，頁 228）。

¹³此文收入王芝琛、劉自立所編《1949 年以前的大公報》，頁 109-111。有學者認為張季鸞是「國家中心論」的實踐者（吳廷俊，2004）。

國族想像不必然呼應於現實政治狀況的例子，也發生在 1949 年後的台灣（雖然就時間序列而論，1931 年張季鸞心目中國族想像所對應的「四萬萬同胞」可能並未包括當時仍處日本殖民之下的台灣）。1949 年底，國府在經歷國共多年的分合鬥爭之後敗走台灣，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國祚，也在台灣獲得延續。原本居於優勢的國民黨政權對江山拱手痛定思痛，來台後，一方面進行黨內改造鞏固蔣介石所集權領導的國府政權，¹⁴一方面則以「反攻大陸」為最重要政治、軍事目標。為合法化國府在台的統治以及繼續宣稱對中國大陸擁有合法主權，必須設法把握住其在國族意識形態上具「正統」地位的論述軸線：孫中山是創建中華民國居功厥偉的國父，而蔣介石則是孫中山最忠實的追隨者，也是孫的革命建國大業不做第二人想最合法的繼承人；強調從孫中山推翻滿清、創立「三民主義」、建立黨軍，到蔣介石繼承其遺志完成北伐、領導中國對日抗戰一路下來的豐功偉業。¹⁵國府來台後，透過學校歷史教科書與新聞媒體相關內容所建立起來的民國歷史論述，基本上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經過選擇與簡化之事實所組織成的敘事脈絡之下。而面對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與當時社會情境，這個國族認同的建構任務，要求更複雜細緻的工程。

台灣經歷日治五十年，從日治初期的對漢文採漸廢政策，廣設日制公學校，到後期積極的推動「皇民化運動」，殖民者致力要教育台灣島民成為講日語、用日文的日本人（許雪姬，1991；周婉窈，2009；吳文星，1996），關於日本國族認同的形塑，也透過「莎勇之鐘」、「國歌少年」之類的悲壯感人故事在民間傳頌，而不斷的被再生產。¹⁶學者方孝謙甚至認為，如果不是二次大戰日本戰敗讓台灣復歸中國，繼續被日本統治的台灣將會變成另一個沖繩。¹⁷但日本戰敗了，這讓日治期間就存在島內的各種以提升民智的文化運動、或爭取平等政治權力的政治社會運動為掩護的各種反殖民統治的力量，¹⁸一時之間對祖國的降臨懷抱滿腔希望。1945 年 10 月 25 日，當時在《民報》擔任編輯的吳濁流，站在台北公會堂

¹⁴ 關於 1950 年國民黨的這次改造運動始末可參見李守孔（1994）、陳三井（1994），兩文對於改造運動結果有助「鞏固領導中心」看法一致。

¹⁵ 秦孝儀在《先總統蔣公對國父思想之實踐篤行與融會貫通》一書的〈緒言〉中指出：「總統蔣公憲章國父，既以東爭、北伐、抗戰，趨國家於統一，以清黨、戡亂、改造，維黨紀於清明……國父一生遺志大願，舉如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民主憲政之實施，民生主義耕者有其田之貫徹……莫不一一如符節之必合，如囊牆之響答，總統於國父思想之實踐篤行，蓋至矣盡矣！」（秦孝儀，1988，頁 1）

¹⁶ 「莎勇之鐘」、「國歌少年」兩個在當時流傳甚廣的故事。前者描述泰雅族少女莎勇為即將從軍的日本老師背負行李下山渡河時，遭急流沖走滅頂的淒美故事（周婉窈，2009a）；後者是關於一個在地震中受重傷的少年學生，臨死前仍堅持要唱著日本國歌「君之代」的事蹟（周婉窈，2009b）。兩者都是日治時期，殖民統治者為對台灣人施行「愛國教育」所創造出來的「國家神話」。

¹⁷ 方孝謙指出，1920 年代，由於許多台灣留日學生回台後大量輸入各類新思潮，雖然讓殖民地人民興起爭取權利的政治社會運動，但也讓日本文化取得進步的道德正當性，日本的統治不再只是強制高壓的，而逐漸建立起具正當性基礎的「文化霸權」，但一開始還是一個弱勢霸權，但如果不是 1945 年日本戰敗，台灣回到中國，這個「弱勢霸權」便可能成為「強勢霸權」，讓台灣變成日本的另一個沖繩（方孝謙，2008，頁 184-185）。

¹⁸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議會請願運動等與殖民統治對抗的事蹟，可參閱葉榮鐘（1987）、周婉窈（1989）。

(今中山堂)前觀看受降典禮：

歷史性的受降典禮開始，高喊萬歲的聲音搖撼了整個公會堂...這樣，台灣就完全復歸祖國，從五十年的殖民生活解放出來。我作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我私自下個願望：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成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台灣，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理想，也是全台灣的民眾，六百萬島民的熱望。(吳濁流，1988，頁 172-173)

1945 年國府接收台灣時，民間「箪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盛況，深刻的留存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並見諸文字記載（吳濁流，1988，頁 138-141；葉明勳，1995，頁 101-102；葉榮鐘，1985，頁 286-287）。¹⁹

但在「回歸祖國」與「光復台灣」的短暫歡欣之後，接下來的，是對統治者與被治者都充滿實驗性的艱難任務---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把台灣從日本變成中國。對統治者來說，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把各個層面上都已經開始日本化的台灣社會再度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歷史記憶的選擇性抹除與重塑、再造成為必要的工程，欲於此圖，除了國民教育體系之外，²⁰掌握論述生產的大眾媒體是第一個要拿下的陣地（邱家宜，2013，頁 235-236）。戰後一年，陳儀領導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¹⁹ 根據彭瑞金的台灣文學研究，終戰後的最初一年半間，「祖國」是被台灣文學默認的。例如，日治時期曾經參與「台灣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運動的楊逵，從終戰開始就全力引介「祖國」的文學與文化（彭瑞金，1993，頁 65-66）。

²⁰ 根據台灣省教育廳的官方文書，從 1945 年到 1948 年間，的台灣省的教育政策重心為「中國化的奠基教育」，目標在「滌除日據時代皇民化教育的毒素，代之以中國化的教育」（台灣省教育廳，1955）。1946 年台灣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印的《國民學校暫用歷史課本》（小學四、五、六年級用）在一開始的編輯大意中就提到：「本書旨在排除歷來日本的謬誤宣傳，使學生認識祖國，了解世界現勢，而以激發民族意識，引導學生有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志願與信心為中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a）歷史課本的第一課就叫做「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叫中華民國，簡稱中國。……」第二課「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民族叫中華民族，其中包括著漢、滿、蒙、回、藏、苗六大族。……台灣人大多屬漢族，是從福建和廣東遷來的。」其他內容還包括：中國的歷史遠比日本悠久、日本文化是師襲中國文化、甲午戰後台灣人曾抗拒割日、國民政府領導國民革命統一全中國、日本對中國的種種欺凌與侵略，以及中國終於聯合世界其他民主國家戰勝日本等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a）。約在同一時間編定的《中等學校暫用中國歷史課本》內容則較為詳細，更強調台灣自古與中國就有淵源，日本則是個開化較晚，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對辛亥革命、蔣介石的貢獻、日本侵華也都有更多著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b）；而由於當時台灣的中學生根本不懂中文，所以《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的內容也是以極為簡單、簡短的白話文寫成，內容共五十課，包括：「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的祖宗」、「中國收復了台灣」、「我們的國旗」、「中華民國」、「孫中山先生」、「孔子」、「日本學生到中國來」（作者按：指日本「大化革新」的漢化運動）、「倭寇」、「鄭成功」、「中日戰爭」、「台灣人抗日」、「日本和中國軍閥」、「中國軍隊是有力量抵抗日本的」、「全國的抗戰展開了」、「我們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這八年間」（作者按：指對日抗戰八年）、「我們希望日本成為我們的朋友」、「三民主義」、「大同世界」等，五十個單元中，有二十個與重新詮釋台灣、中國、日本三者間的關係，以及中國文化的優越與正統有關（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c），無一不傳達國家認同再造工程全面登場的強烈訊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當時「反共抗俄」階段尚未開始，課本中稱許共產蘇聯是經過奮鬥所爭取來的「工人和農人的國家」（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c，頁 42-43）。

就通令廢除報紙日文版，當時島內知識階層曾群起反對，認為形同剝奪大多數台民的閱報權（何義麟，2005a）。當時外省籍公務員還曾經出現「台灣人被奴化」的言論，引起當時輿論很大的反彈。²¹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台灣戰後推行「中國化」的一大頓挫。二二八事件之後兩年多，歷史的發展讓國府中央被迫遷到這個兩年前曾經大舉派兵鎮壓，造成大量死傷的東南沿海島嶼，在當時島民對事件記憶猶新之下，如何重塑有利國府統治的國族意識形態，顯然需要更多的人為努力。

首先，在所有相關論述中，之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歷程，必須極度加以淡化或以殖民壓迫一語帶過，絕口不提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與文化各方面所產生的各種影響。²²相反的，更早之前鄭成功經營台灣的歷史則受到凸顯與表彰，²³一方面強調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也以鄭氏「反清復明」對照孫中山的「推翻滿清」，更作為國府「反攻大陸」意圖的一種隱喻。而一度造成整個台灣社會巨大動盪，並留下難以泯滅之深刻傷痕的二二八事件，當然更成為言論或文字的「禁區」。²⁴事發當時在《民報》擔任編輯的吳濁流，有生之年一直想為他所目睹的二二八事件留下一點紀錄，但是當他在1968年寫成《無花果》一書時，他的摯友鍾肇政非常為他擔心，因為：「此時此地，可寫的事多矣，唯獨二二八該是禁忌中的禁忌，誰敢去碰這種事！……至少在我，在那個階段，連想都不曾想過要寫二二八。」（鍾肇政，1987，頁2）直到吳濁流去世後隔年（1977），距離《無花果》完成已將近十年，張良澤在編輯《吳濁流作品集》時，仍然無法將《無花果》及較晚完成的，同樣記載了二二八事件相關內容的另一本自傳《台灣連翹》收入。

要控制言論，新聞媒體首當其衝，二二八事件之後，當時較敢言的報紙如

²¹ 指1946年4月29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范壽康在「台灣省訓練團」的一場名為「復興台灣的精神」的演講中，批評本省人排斥外省人、有獨立思想，被日本人「完全奴化」。演講內容經《民報》披露，5月1日適逢台灣省參議會開會，參議員郭國基因此提案調查范壽康的發言，經議會表決通過，交由郭國基、蘇惟樑兩位議員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民報》報導屬實，范壽康以通譯口誤來解釋，並赴議會道歉收場（鄭牧心，1987，頁76-78；何義麟，2007，頁206）。

²² 戰後國府接收台灣後開始實行「去殖民化」工程。對行政長官公署來說，去殖民化就是「祖國化」，必須將島上所有日本人留下的痕跡都加以消除，唯有文化上完全中國化，台灣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國民。因此不但通令廢除報紙日文版，為除去遺留在台的日本文化「毒素」，大量焚毀日文書籍（何義麟，2007a，頁233-235）。

²³ 從1946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編寫的中小學暫用教科書中，就開始凸顯鄭成功的歷史地位。在《中等學校暫用中國歷史課本》第十三單元的「本省簡史（二）」中，提到鄭成功及鄭經父子在政治、軍事、教育、產業各方面都有許多建樹，「真是本省文化的開創者」（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b，頁18）；《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的第二十三單元就叫做「鄭成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c，頁17-18）。一直到1988年的一項研究中仍發現，台灣的小學教科書依然將鄭成功與蔣中正並列為「光復台灣的兩位偉人」（戴寶村，1988）。

²⁴ 關於二二八事件相關歷史記憶的抹除，執行得驚人的徹底。除非有相關的家族歷史記憶，或曾透過極少數非公開管道得知這段歷史，大多數1940年代以後在台灣出生的人，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從來不知道台灣發生過二二八事件。歷史學者陳芳明是1947年二二八發生的那一年在高雄左營的本省家庭出生的，他大學讀的是歷史系，但他一直到1969年大四那年，偶然在學弟書房中看到題為《台灣暴動事件紀實》的禁書，才第一次知道有二二八事件的存在，直到1974年赴美攻讀博士才開始真正接觸並積極蒐集該事件的相關資料（陳芳明，2003，頁146-147），1991年出版他對相關歷史的研究成果《謝雪紅評傳》。

《民報》、《人民導報》都被查封，被行政長官公署關掉的報館多達十幾家（邱家宜，2011，頁 146-145），台灣本土菁英的報業經營受嚴重的打擊（何義麟，2005：5）。1949 年間國府中央遷台，大批的新聞工作者也由中國大陸陸續進入台灣，這批久經歷練的新聞工作者，多數任職於國民黨或軍方系統的報社，部分則在公營新聞媒體或與統治者關係良好的民營新聞媒體工作，成為穩固國府在台灣統治正當性的稱職文宣團隊。在他們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新聞必須服務於國家（政府）：「新聞自由好比一個武器，國家很鄭重的把這武器交給了我們，用之得當便能善盡我們教育社會的責任，用之不得當便只能製造罪惡，貽害國家和社會」（蕭同茲，1951，頁 32）只要在政治上是正確的，新聞可以用來做宣傳：「只要不違背國家利益、只要不辜負讀者的期望，只要不影響報紙本身的業務」，宣傳並不會影響報紙的品格（荊溪人，1951，頁 5）。而這些理念必須要有一個絕對正確政府，與絕對英明的領導人為其合理化的前提，因此曾虛白提出了對記者角色詮釋的「三覺論」，²⁵他將人民比喻成劉阿斗，必得有諸葛亮來扶持。諸葛亮就是國家領導人，而新聞記者就是國家領導人的代言人。在〈申論三民主義新聞政策〉（曾虛白，1982，頁 150-156）一文中，他強調新聞工作者是先知先覺者（國府領導人）要說服不知不覺者（台灣人民）的「後知後覺者」，也是前兩之間的橋樑。

1950 年代，絕大多數台灣新聞媒體的言論都被規範在「反攻大陸」為前提的國家最高政治、軍事目標下，²⁶台灣是依附在作為返回中國大陸之「反攻跳板」、「復興基地」的意義與價值下而存在的，偶爾曾經出現，敦促朝野反省現狀的「反攻無望論」，也只是曇花一現的擾動，很快就淹沒在主流論述的洪流中。²⁷1966 年正式全面啟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則是國府把原本已經編織構建得相當周密的一個「反攻大陸後的未來式國家」認同，以及「國家=國府政權=領導人蔣介石」的這個認同符號系統，再升等、擴充的代表作。而在此之前，綿密的國家意識形態建構工程已經陸續綻開。

四、 各種「運動」的集體精神動員

蔣介石於 1953 年底提出他紹續孫文思想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以下簡稱《補述》），其中類目包山包海，幾乎囊括人民日常生活的所有各個層面，這

²⁵ 關於曾虛白的相關介紹與評述可參閱《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邱家宜，2011）。

²⁶ 這種「一切為反攻」的論述在 1950 年代不斷出現在專業新聞工作者所組成之「台北市編輯人協會」出版的《報學》期刊中，從期刊內容中可以發現，這些專業人士對其自身角色與專業的理解，與今日傳播學術機構中對新聞專業工作者應作為社會「守門人」的理解明顯不同，作為「反攻大陸」文宣部隊的任務明顯高於其他，可稱之為「反攻大陸新聞學」（邱家宜，2012）。

²⁷ 指雷震及其所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上的其他作者，在 1950 年代，因體察到國府要反攻大陸並非短期內可能實現，因此改主張民主務實路線，希望國府能好好經營「自由中國」台灣，真正落實民主憲政、維護人權。後來被官方的言論檢查者總結為所謂的「反攻無望論」（邱家宜，2011，頁 172）。

代表當時台灣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的幾乎每個面向（包括遊山玩水、看戲），從此都有了一套官方指導原則。對於文藝影音的欣賞與創作（廣義的可以包含報紙各種內容），《補述》中認為，商業化帶來「黃色的害」，共產黨運用文藝運動散播「赤色的毒」，台灣雖然已經有反共抗俄的台語劇跟電影，但「純真和優美的文藝作品還是太少」、「表揚民族文化的作品還在萌芽和生長之中，還不夠充實」（蔣中正，1967，頁 67）；並反對廣播與電影的商業化，認為會走向低俗與墮落，主張電影與廣播應先由國家經營（同上，頁 72-73）。《補述》的發表，代表國府對台灣的統治，已從 1949 年剛開始的政治、軍事面層面，進一步深入為建立文化霸權階段，也是接下來一連串國民精神動員的先聲與前奏。

首先登場的是「文化清潔運動」。該運動是由國民黨輔導成立的文藝社團「中國文藝協會」所發起（陳紀滢，1977，頁 69-70），要求針對《補述》中所點名反對的「黃色的害」、「赤色的毒」，再加上「黑色的罪」這「三害」，進行清潔掃除。但觀諸實際發展，運動的主要重點卻放在《補述》中所未提及的「黑色的罪」（林果顯，2005，頁 62）。而根據 1954 年 8 月 9 日「中國文藝協會」在台灣各大報所刊登的〈自由中國各界為推行文化清潔運動厲行除三害宣言〉，所謂「黑色的罪」，指的就是新聞報刊專門揭人隱私、捕風捉影、造謠生事、傷風敗俗，專門製造社會黑暗，不但影響國內人心，還影響海外僑胞對反共基地的觀感，以為自由中國到處皆是這種烏煙瘴氣之事，「共匪」更是利用這種「在台灣出版專門罵台灣」的書刊來破壞僑胞對「祖國」的向心力（陳紀滢，1977，頁 83），這顯然完全是針對當時的新聞界而來的。宣言中強調支持言論自由，但不能容忍「造謠惑眾的自由」、「傷風敗俗的自由」、「誣蔑誹謗的自由」，乃至「危害國家民族的自由」（中國文藝協會，1954）。並主導各社團成立「文化清潔運動促進會籌備會」，接受各界檢舉「三害書刊」，隨即公布結果。湊巧的是，內政部也在結果公布的同一天去函省政府，要求在「三害」名單中的十家雜誌定期停刊，更巧的是，兩件事情隔日（1954 年 8 月 28 日）見報時，也同時刊出七十五家雜誌連名提出的，支持政府此次取締行動的共同宣言（林果顯，2005，頁 68）。

當時台灣較具批判性的新聞媒體如《公論報》、《自由中國》立刻對這一連串發展提出侵犯言論自由的質疑，²⁸但內政部卻仍「裏應外合」的在 1954 年 11 月 5 日公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九項禁令（《中央日報》，1954）。²⁹由於九項禁令包含極廣，而模糊的文字敘述，可以用來大幅壓縮新聞媒體言論空

²⁸ 《公論報》於 8 月 12 日刊出社論〈再論「文化清潔運動」〉，8 月 30 日刊出社論〈過猶不及——論政府對十家雜誌的處分〉；《自由中國》11 卷 6 期（1954 年 9 月 16 日）刊出葛泰山的〈從內幕雜誌停刊說起〉，都擔心言論自由受到威脅。

²⁹ 其所列舉之禁止、限制的內容包括：1. 涉及政治、軍事、外交之機密而有損國家利益者 2. 誇大描述盜匪流氓等非法行為而有誨盜作用者 3. 描述自殺行為而有助長自殺風氣之虞者 4. 描述少年犯罪行為而有助長少年犯罪之虞者 5. 描述賭博或吸食煙毒之情景足以誘人墮落者 6. 描述猥褻行為而有誨淫作用足以影響社會治安者 7. 傳佈荒謬怪誕邪說混亂社會視聽者 8. 記載不實之消息意圖毀謗或侮辱元首或政府機關名譽，足以混淆社會視聽者 9. 對於法院刑事訴訟進行中案件之批評，足以混淆社會視聽者。

間，因此消息一出整個台灣新聞界為之震動，³⁰11月8日台北市報業公會召開臨時大會，決議向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請願，10日發表反對政府壓縮新聞自由聲明，各報社社長當天並連袂拜訪俞鴻鈞。新聞界前所未有的大動作，讓行政院不得不先讓步，於11月9日俞鴻鈞與報社社長見面前，就發布暫緩執行九項禁令（林果顯，2005，頁70）。但報人的集體危機意識並不能阻擋國府落實控制言論的決心，1958年6月17日立法院在民營報紙輿論一片譴責聲中，火速完成「出版法修正案」三讀（陳國祥、祝萍，1987，頁69-71）。修正條文大幅擴大行政官署權力，對於其裁定認為違法的報刊可以逕行「沒入」、「撤銷登記」，被指為「比軍閥時代還嚴厲」、「公然違憲」，甚至發出「歷史將制裁你們！」的嚴厲控訴（陳國祥、祝萍，1987，頁69-71）。雖然前面曾經提到過，當時大多數大陸來台新聞工作者對於「反攻大陸」、「維護國府統治下的黨國體制」都是站在認同與支持的立場，但國府當局對於光靠業界「自律」仍難以放心，非得祭出嚴厲的「出版法」不可，顯示其深刻體認對言論機關之控制，攸關其維繫統治之正當性至鉅。

1950年代，國府先是標榜自由民主爭取美國支持，但在韓戰爆發，軍事與政治上都獲得美國更明確支持之後，又以動員戡亂體制凍結憲政。為了要在名實不符的情況下，持續這種表裏不一的矛盾，國府採行的是一再透過各種管道，宣傳即將爆發的反攻戰事的策略，利用戰時體制達到一切動員與全面控制的效果，藉由戰爭氣氛塑造個人生命與國家存亡連成一體的感覺（林果顯，2005，頁80）。從「文化清潔運動」到接下來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種「由官方幕後策動，但看似由民間團體發起，並號稱獲得全民自發響應」的運動模式，成為國府以不斷的集體精神動員，鞏固其戰時體制統治基礎的一貫模式（林果顯，2005，頁80-81）。被納入國家「侍從體系」的大眾傳播媒體（林麗雲，2000），則被賦予擔任各種精神動員的宣傳管道，甚至鼓吹旗手，而相關的報業、作家團體也都紛紛投入這個鞏固領導中心敘事建構的大工程中。除了「台北市編輯人協會」出版的《報學》雜誌大力鼓吹「攻大陸新聞學」（參見註26），以及「中國文藝協會」主導發起「文化清潔運動」，還有「中國青年寫作學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等「官資」、「官護」或「官立」的文藝組織，在各種符合政府政策的相關議題上相互策動呼應。而1950年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則每年以鉅額獎金鼓勵具有「反共抗俄之意義」的各類文藝作品（彭瑞金，1991，頁72-73）。³¹於是，不但報紙正刊的文字必須符合鞏固領導中心的政治正確，連軟性、文藝性的報紙副刊，也都掛起反共抗俄的招牌。

1966年5月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這對於治權僅及於台灣，

³⁰ 不但《公論報》、《自由中國》提出嚴厲批評，連相對溫和的《自立晚報》、《聯合報》、《民族晚報》，甚至英文報紙《英文中國日報》也都同聲反對（陳國祥、祝萍，1987，頁67）。

³¹ 1949年底，蔣介石在草山會議決定進行國民黨黨內改造的同時，也決定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獎勵從事「反共抗俄」文藝創作的作家。該委員會共有張道藩、張其昀、陳雪屏、狄膺、程天放、羅家倫、胡健中、陳紀滢、李曼瑰等十一位委員。由張道藩擔任主任委員，並假張道藩擔任董事長的中國廣播公司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的辦公室開始辦公。除每年一次評選發獎金，平常也接受投稿，經錄取後逕付稿費，再介紹給各報刊登。由於獎金、稿費豐厚，在1950年四月前就收到各界投來稿件不下數百萬字（陳紀滢，1977，頁6-7）。

卻又矢志統一中國而必須不斷汲汲於維繫其統治正當性的國府政權而言，正是天賜良機，文化大革命要求的與傳統文化徹底切割，正好讓國府在紹述中華文化正統上取得絕佳發言位置，以此對比出中共政權已經成為民族文化的罪人。1966年11月12日蔣中正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典禮中發表〈國父一百卅一誕辰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在這份重要文獻中他明確指出，國父孫中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統」的繼承人，國父的三民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的精華，將傳統文化在瀕於熄滅中絕之際，再度發揚起來。而大陸陷共，台灣做為復興基地，所有人民在中山樓落成之際，「須知此為復興基地重建民族文化之標誌，當益堅其消滅赤禍、重光大陸之信念」，早日將青天白日的光輝，普被於大陸疆土（蔣中正，1969，頁1-3）。這篇講詞中的主要概念，後來在各種公開儀式性場合、新聞媒體報導評論、學校教科書、官方文件中都不斷被重複提及，扼要地說：傳統文化與現實戰鬥間存在重要連結、繼承國父遺志的蔣中正，以及肩負反共抗俄任務的台灣，成為中華文化唯一的傳承者與復興者。而文化復興最終的訴求在於反攻大陸，實行三民主義建設復興基地則為具體作法。於是乎「道統---國父---蔣（中正）總統」、「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反攻大陸」成為整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主軸（林果顯，2005，頁85），這套把領袖等於國家，反攻大陸等於復興文化的國族認同敘事，有助於解釋為何國府統治下的台灣，雖然在國際情勢與實際力量上都無法反攻大陸，但透過這套認同敘事的架構與指導原則，卻得以在民主憲政的名義下用諸多臨時舉措限制人民權利、鞏固領導核心，將「創制的傳統」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1969年6月26日，蔣中正在「第三次新聞工作會談」中親自對各新聞媒體主管說：「全體新聞從業人員，要切實負起新聞事業的社會教育責任，鼓舞青年們，一齊以光復大陸、拯救同胞為職志。」（蔣中正，1975，頁24）值得注意的是，在1966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開始啟動的這個時間點上，之前還存在少數幾個敢對執政當局提出批評的異議性報刊《自由中國》、《公論報》、《時與潮》，不是已經停刊，就是即將面臨停刊，³²異議「雜音」已經被一一清除。弔詭的是，在這個階段，雖然「反攻大陸」在客觀上已經明顯地不可能，但整個大眾傳播媒體參與塑造黨國體制下「未來式的統一中國」的國族認同敘事之建構的盛況，卻達到空前的高峰。

五、「本土化轉向」對台灣社會國族認同的影響

1970年代是台灣社會國族認同的一個重要轉折階段，大眾傳播媒體是這種轉變徵兆最早呈現的舞台，其中具代表性的事件，是發生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

1971年10月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在此之前，美國將釣魚台管轄權交給日

³² 《自由中國》是在1960年9月雷震案爆發後停刊，《公論報》在1962年停刊（邱家宜，2011）；《時與潮》在1967年停刊（邱家宜，2013）。

本，這兩件事情一度讓台灣陷入某種強烈民族主義的情緒中。彭瑞金認為，當時島內中國民族主義者企圖以高漲的民族意識，來包攬官方長久以來對台灣政體曖昧不負責任和無能而不誠實的罪責，孰料官方不但不領情，反而懷疑他們本是來自官方所刻意宣揚之國族主義的民族統一情結中，隱藏與中共掛勾的意圖，島內部分保釣人士深受挫折之餘，「不得不從虛懸的民族主義回到現實來思考」（彭瑞金，1991，頁 150）。保釣激情退卻後所產生的一種對內反省的氛圍，剛開始是透過文學寫作態度與風格之爭的方式出現。王拓在他被公認為 197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開箱文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指出：「保釣運動替我們的社會大眾上了很寶貴的一課政治教育，……使我們認清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要爭取國際的生存權，首先還是在於自己國內政治和社會的徹底革新！」（王拓，1977）幾個月後，他又在聯合報副刊上對自己的文學做了一番告白：「我們家從福建遷移來台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的祖先一代接一代在這塊土地上不斷辛勞地、勤懇地、滿懷期待地工作著……我們是兩腳深紮在這塊土地上的一群人，死了也還在這塊土地上，和這塊土地合而為一、混為一體。……我所寫的一切文字，包括小說、報導和評論，都是從對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人這種堅定不移的愛心和信心出發的。」（王拓，1977a）

而在此前後，陳映真、尉天驄、陳鼓應等人分別在《仙人掌》、《夏潮》、《中華雜誌》上發表文章，³³主張文學要關懷社會、批判現實，反對當時主流的現代主義式偏向意識流，晦澀、蒼白、自我，與現實政治經濟環境與真實生活脫節的文風。同一時期，之前因為受反共文藝打壓而潛入地下成為「伏流」的吳濁流、王詩琅、葉石濤等作家的聲音也開始陸續浮現，包括吳濁流早期作品，以及鍾理和、楊魁在日治時代的作品再次獲得重視（洪儀真，1997，頁 114）。在一開始，回歸鄉土意識所遭遇到的反對聲音同樣、甚至更為激烈。包括彭歌、余光中、朱西甯等人紛紛在報紙副刊撰文痛擊鄉土派、寫實派作家，其中以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1977），點名批判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三人。余光中的〈狼來了〉，更明確地給主張或實踐鄉土寫實派的作家們，戴上了當時最令人畏懼的「紅帽子」。他把鄉土寫實文學等同於共產黨所倡導的「工農兵文學」，文中甚至出現：「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余光中，1997）的驚悚措辭。朱西甯則指責鄉土寫實派作家們犯了「地方主義」的錯誤（朱西甯，1977）。陳映真曾為此質問，為何以大陸特定地區鄉野風土為題材不是地方主義，但在台灣成長從沒有大陸生活經驗的作家，以台灣相關事物為題材就是地方主義（石家駒，

³³1977 年 7 月 1 日，陳映真在《仙人掌》第五期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應社會〉；1977 年 8 月 1 日尉天驄在《夏潮》17 期發表〈文學為人生服務〉，11 月間又在《中華雜誌》172 期發表回應彭歌的〈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1977 年 11 月與 12 月，陳鼓應連續在《中華雜誌》第 172、173 期上發表〈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義〉、〈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火力全開。以上諸文均收入尉天驄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

1978)。³⁴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寫實派所懷抱的民族主義情結中，其實是同時混雜了台灣意識（台灣情結）和中國意識（中國情結）的，但相較於當時以《夏潮》為主的左翼論述，台灣本土派的作家接收了更多論戰的成果，相較於左派所關心的階級問題，省籍問題更引起社會的討論與關注（洪儀真，1997，頁178）。³⁵

與「鄉土文學論戰」大約平行進展的，另一個足以反映台灣社會中國族認同轉化之發展軌跡的，是對於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所要呈現的，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國族認同樣態的相關討論。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在國族認同上所留下的一個「懸案」（彭瑞金，1993，頁65）。從對《亞細亞孤兒》一書歷史定位的描述，與對書中主角胡太明性格的不同詮釋，可以觀察出當時台灣社會中國族認同的兩股不同力量之間的緊張與對抗。陳映真認為吳濁流以此「反對帝國主義，追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為主題，使台灣日治時代的抵抗文學，成為整個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文學主流合而為一，而具有中國的性格。」（陳映真，1976）王曉波也強調，吳濁流的「客家人意識」乃是漢民族意識，符合地方主義匯聚合成一民族主義的規律（王曉波，1986，頁274）。張良澤卻以「萌芽期」、「成長期」、「批判期」來解讀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張良澤，1988）。陳映真以「『優柔不斷』、『袖手旁觀』、中庸主義、逃避觀望的知識份子的悲劇。」（陳映真，1977，頁53）來批評書中主角胡太明，以對比於該書中其他幾位投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行動的角色。但鍾肇政卻認為，吳濁流塑造這個人物，正是為反映當時台灣知識份子的認同掙扎：「胡太明可以說就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平均人物」（鍾肇政，1976：66）。不同意見者對吳濁流國族認同的詮釋與理解，或是對其小說中主角胡太明的評價，顯然與其對此詮釋的期待有關，無怪乎葉石濤要指出，《亞細亞的孤兒》主要描寫的就是台灣人在近代歷史中所面對的認同危機，他認為，吳濁流明顯的指出了台灣人身上「中國意識」和「台灣意識」的頹頹，但小說的某種曖昧性卻讓爭論的雙方都可以據以爭辯（葉石濤，1990，頁9-10）。

前述的論辯，都以過去因為多以文學為主要文類，而相較於正刊版面內容受限制較少的報紙副刊（例如《聯合報》副刊），或者以雜誌（《仙人掌》、《夏潮》、《中華雜誌》、《台灣文藝》）為發表場域。1975年《台灣政論》創刊，³⁶正式開啟了台灣的「黨外雜誌」時代，³⁷被學者視為台灣「戰後媒體反抗運動」的重要一環（管中祥、劉昌德，2000），黨外雜誌以衝撞既有政治、文化霸權體制為常態，也為之前已經開啟的認同辯論關建出新場域。1983年6月，創作「龍的傳人」歌曲的侯德健經香港入境中國大陸「投奔祖國」，在台灣社會中引起很大波瀾，林正杰辦的《前進》周刊在第12期刊出陳映真（1983）的〈向著更寬廣的

³⁴ 石家駒是陳映真所用的筆名之一。

³⁵ 關於省籍問題的相關討論可參見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施正鋒（編）《台灣國家認同》。

³⁶ 《台灣政論》由黃信介（發行人）、康寧祥（社長）、張俊宏（總編輯）所創。

³⁷ 彭琳淞曾經對黨外雜誌的發行種類與系譜進行十分詳盡的整理（彭琳淞，2004）。

歷史視野)、林世民(1983)的〈龍沒有穿衣服〉;第13期刊出蔡義敏(1983)的〈試論陳映真的「中國結」〉、陳元的(1983)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第14期又刊出陳映真(1983a)答辯的〈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一文,再度掀起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爭論。接下來包括《生根》、《夏潮論壇》(《夏潮》被停刊後再出版改用的名稱)等刊物都參與了論戰。³⁸讓國族認同問題逐漸正面的浮上了公共論辯的場域。

六、解嚴後大眾新聞媒體內容中所呈現的認同分殊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988年報禁解除;1993年第一家衛星電視台TVBS開播,1997年第四家無線電視「民間全民電視台」開播,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壟斷電視媒體的局面正式被打破;1999年出版法廢除。一連串的解禁措施,台灣島內言論市場氛圍一時之間如百花齊放,在之前已經逐漸醞釀發展的不同國族認同觀點,遂與統、獨的不同政治主張結合,直接搬上像報紙這樣普遍發行的大眾新聞媒體的正刊,甚至社論版面上,社會觸及面也更大,讓台灣社會國族論述的「被創制的傳統」推進到另一個階段。而濫觴自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台灣本土優先」與「寄望未來統一之中國」的分歧甚或對抗的基調,持續出現在立場不同的報紙言論版面上。接下來試以《聯合報》與《自由時報》這兩個藍綠、統獨政治立場迥異之主要報紙的幾篇重要社論,來一窺島內分歧的認同樣態,是如何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傳播與再生產的。

相較於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聯合報》在認同論述的生產上可以說是最有系統,也最具一致性的。在該報2011年出版的《從漂流到尋岸---聯合報兩岸議題社論選集》一書中可以發現,該報二十多年來一直試圖透過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撰寫,在排除台灣「獨立建國」的前提下,以各種方式希望為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尋出路。先後提出「筷子理論」、「杯子理論」、「五個中國」、「統一公投」、「屋頂理論」等概念。「筷子理論」是由該報總主筆黃年在1990年所提出(《聯合報》,2011,頁2-3),大意是說:兩岸有如一雙筷子,兩支筷子分開(台灣獨立建國)則無法使用,兩支筷子綁死(兩岸立即統一)也無法使用,要讓筷子能正常運用必須有些地方「離」、有些地方「合」,「離」、「合」互動筷子才能使用(同上,頁3;《聯合報》,1997);「杯子理論」是指:台灣是水,「中華民國」是杯,如果沒有「中華民國」這個杯來把水盛住,台灣無法獨立存在(《聯合報》,2009)。該書序言中闡釋,台灣從1987年解嚴以來,兩岸關係最大的改變是由咬定統一或獨立的「目的論」,轉為強調以合理化的過程來累積實現目的之條件的「過程論」,不論「筷子理論」或「杯子理論」都是要強調從「合理的過程」往「改善

³⁸ 1983年9月10日出版的《生根》周刊第17期中刊載陳伯瑜的〈校園內的台灣結與中國結〉,文中提到侯德建在國府的大中國情懷教育下「日夜眺視新店溪,憾不能見黃河壯」又「夢裡神遊長江水」,終於去實現它的故國夢後,又被國府指控「叛國」;1984年3月及4月,《夏潮論壇》企劃了〈「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的虛相與真相〉一文,內容是陳映真與戴國輝的對談(葉芸芸整理),對「台灣人意識」進行了一番檢視。

之目的」推進（《聯合報》，2011，頁3）。

《聯合報》社論也提出「五個中國」的概念，第一個是文化及歷史的中國；第二個是1912-1949年間由中國國民黨所領導並產生中國共產黨的中國；第三、第四個是1949年之後到台灣的中華民國以及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與第四個中國未來是否進行政治整合，即是第五個中國的問題（《聯合報》，2011，頁6）。「屋頂理論」則是以一個中國為屋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屋頂下的兩個房間（《聯合報》，2000）。簡而言之，《聯合報》在台灣的「後反攻大陸」年代來臨之後，為了要延續過去國府所全力經營締造的「未來統一的中國」的這個國族想像，抵抗日益蓬起的本土化風潮、台灣中心觀，甚至是台灣獨立的主張，可以說嘗試了各種論述策略。

反觀《自由時報》則在1997年間國民大會完成凍省修憲後出現〈以台灣為適用範圍的新憲體已經誕生〉的社論，盛讚省級政府虛級化後，台灣的政體已更加名實相符，不必再為了要維持「中華民國法統」而存在的省級政府，耗費龐大社會成本（《自由時報》，1997a），公然站在「未來統一的中國」此一國族想像的對立面；該報在另一篇〈台灣又跨出歷史新的一步---並呼籲對凍省後的善後工作作妥善規劃〉社論中指出，在香港移交中國的局勢中，為避免台灣被矮化為地區政府，必須凍省。而「四百年來，台灣由外來政權的殖民地，兩度被建省，如今以法律形式宣告凍省，正是向世人宣告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自由時報》，1997b）1998年，當時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率團前往中國大陸參訪，行政院長蕭萬長提出「兩岸基層民主交流」主張，《自由時報》也讚揚此舉是以民主政治來對抗中國的民族主義（《自由時報》，1998）。1999年，李登輝總統所提出的「新台灣人」概念，在官方民調中獲得逾六成的民眾支持，《自由時報》也以社論指出，「台灣人」在過去是一個相當模糊的名詞，但近十多年來的民主進程，帶動了對台灣本土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尤其在經過黨禁、報禁開放，以及國會、縣市長、總統的直選經驗，台灣已經建立了不同於對岸中國大陸的民主文化與社會認同：「『新台灣人』的主張，其目的正是強調無論是原住民或任何一批的新住民，只要他認同台灣、愛護台灣，視台灣為一個『生命共同體』，他就是一個『新台灣人』。……正如四百年前英格蘭人遠赴北美大陸移民，先建立『新英格蘭』，……而新英格蘭就是形成美國獨立的十三個州。」（《自由時報》，1999）

《聯合報》與《自由時報》都各自擁有相當數量的讀者，³⁹其社論在國族認同上明顯的互為反調，可以視為台灣社會認同分裂現象公開呈現的舞台，也是在各種相關事件或議題中，相互對抗的言論戰場。社論代表報社立場，讀者投書則是另一個眾聲喧嘩的場域。曾有研究者彙集1995年到2004年間《自由時報》的

³⁹根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ABC）所公布資料，2010年3月《自由時報》每日平均有費報發行量為677,042份（<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may/25/today-life1.htm>）。聯合報並未加入ABC，其發行量因此沒有公開精確數字。根據尼爾森1996-1999年媒體大調查，1999年第一季，聯合報的閱報率為19.6%，雖低於《自由時報》的25.1%，但高於《中國時報》的18.6%（1999年《蘋果日報》尚未成立）（《自由時報》，1999a）。

讀者投書，發現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投書者，是在反省台灣過去半個多世紀，黨國教育體制下的認同形塑，並重新思考國族認同的問題(葉春嬌, 2010, 頁 189-251)。⁴⁰相對於讀者投書，知識分子的言論則以評論或專欄的方式呈顯在報章，1990年代，「台灣教授協會」的成員們，⁴¹就開始積極地在包括《民眾日報》、《台灣時報》、《自立早報》、《自立晚報》、《自由時報》等報章上撰寫專欄或評論，其中有相當多篇幅，都與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或台灣的國家定位有關(施正鋒, 1995)。⁴²

這種試圖重新形塑國族認同的內容，不斷出現在解嚴後的台灣新聞媒體版面上，而這些投書會依論點傾向選擇性地出現在幾個特定報刊上，也顯示大眾傳播媒體在國族認同議題上是有明顯立場的。大眾傳播媒體一方面呈現台灣社會中認同分歧的景觀，另一方面也成為凝聚相同觀點的平台。

七、國族認同的「建構論」---代結論

從上述循歷史脈絡進行的種種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大眾傳播媒體(包括報紙、雜誌)及其內容(包括新聞報導、社論、評論、小說、散文)，在一個社會中除了守望、教育、溝通等被經常討論的功能，不論在過去或現在，在西方或東方，在1949年之前的中國大陸或當今的台灣，確實一直扮演著集體認同形塑的要角。不論是孫中山在清朝末年高舉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還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改提倡「五族共和」；台灣日治時期殖民統治者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或者1960年代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直到1970年代沛然興起的「鄉土文學運動」，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以及「台灣優先」論，與強調兩岸不可分離的「杯子、筷子、屋頂」理論，在報紙版面上的分庭抗禮，大眾傳播媒體在認同形塑上的影響力，相當程度印證了霍布斯邦所說的「被發明的傳統」。

對比於經常被民族主義所強調的「本質論」(essentialism 或稱為「原生論」)

⁴⁰ 典型的例子如下：「小時候，我們不准說台灣話，那時候到外省同學家玩，他們的家長問我是哪裡人，我居然覺得說出自己是『新竹人』(那表示自己是本省人)是很羞恥的事，然後他們都會說，喔，是本省人啊，看不出來耶。我通常都回答我的祖先是廣東梅縣來的，就在這種本省人的自卑感和外省人的虛榮心下長大，唉！我一直像那些外省朋友一樣，瞧不起台灣人，因為他們都很土，很沒水準，還吃檳榔，看哭哭啼啼的歌仔戲，我從小立志長大一定要出國念書，拿綠卡，我要到像美國那種樂園生活，擺脫掉『台灣人』的恥辱，...至今甚至連自己的母語客家話也說不好，閩南話也很不通，唉！這才是我真正應該感到羞恥的吧！...」(雪琳, 2000)。

⁴¹ 台灣教授協會成立於1990年12月9日，旨在號召擔任大學教員的會員們在本身專業之外，也應投對台灣前途與公共事務的關懷，致力於實踐台灣獨立運動。首任會長是林玉体，現任會長為呂忠津。

⁴² 例如1992年，歷史學者鄭欽仁在《自由時報》發表〈唯有國家先定位才能確立大陸政策〉一文指出：「中國一詞從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有不同的涵意。以魏晉時代為例，中國是指華北的地域或政權。但今天所說的中國，自1971年國府被逐出聯合國以來，國際上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當今在談對中國大陸政策或外交政策時，首要之務在國家定位；國家沒有定位，談任何事情都是枉費功夫。」(鄭欽仁, 1992) 台教會成員的相關文章，可參閱《民族認同與台灣獨立》(施正鋒, 1995)。

主張，「被發明的傳統」毋寧更接近「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立場。⁴³ 對於報禁解除以來，台灣社會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所呈現的種種國族認同的論辯、轉型、與再塑造過程，不論是 1990 年代之前居主導地位、神聖不可侵犯的「中華民族主義」，或 1990 年代之後逐漸崛起、聲勢看漲的「台灣民族主義」，在相當程度上，都是在客觀歷史時空條件與行動者主觀意志交互影響下被建構出來的(蕭阿勤, 2012, 頁 334-340)。透過對大眾傳播媒體在此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們將更能掌握「建構論」的具體內涵，或能進一步思考容忍差異以接納多元、練習對話以追求共識，對我們今日處境的必要。⁴⁴

參考書目

- 于右任(1981)。〈民立報發刊詞〉，收入《七十年中國報業史》(賴光臨著)。台北：中央日報社。
- 戈公振(1982)。《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
- 王芝琛、劉自立(編)(2002)。《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 王曉波(1986)。《走出台灣歷史的陰影》。台北市：帕米爾。
- 王拓(1977)。〈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仙人掌》一卷二期。
- 王拓(1977a)。〈擁抱健康的大地〉，聯合報副刊，9月10,11,12日。
- 方漢奇(1981)。《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
- 方孝謙(2007)。《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台北：巨流。
- 中國文藝協會(1954)。〈自由中國各界推行文化清潔運動力行撲滅三害宣言〉，《中央日報》8月9日，三版。
- 《中央日報》(1954)。〈內政部制訂公佈出版品禁止或限制事項〉，11月6日，1版。
- 石家駒(陳映真)(1978)。〈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仙人掌》二卷六期。
- 台灣省教育廳(1955)。《十年來的台灣教育》。台北：台灣省教育廳。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a)。《國民學校暫用歷史課本》。台灣省行政長

⁴³所謂「本質論」指一個人的民族認同(身分)一生下來就決定了，後天無法(或很難)改變，通常擴張性的民族主義主要採取這種絕對的文化性民族定義(施正鋒, 2003, 頁 90)。「建構論」則認為，民族是經過人為想像、建構而來的共同體(Anderson, 1983)，除了建構過去的集體記憶(或歷史)、現在的共同經驗，更要建構未來的共同願景，也就是建立在主觀上的集體認同(施正鋒, 2003, 頁 95)。當然民族的建構不可能完全憑空想像，所謂「建構」是指針對當時已經存在、但未固定化的人群共同特質，加以系統化地述說、整理，從而產生了固定化的特質描述(江宜樺, 1998, 頁 159)。

⁴⁴從這個觀點出發，2012年到2013年間台灣社會所出現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顯然具有高度正當性。因為如果大眾傳播媒體因為股權太過集中，導致言論壟斷而無法反映社會的多元性質，依「建構論」原理，閱聽人的認知將被力量大的一方所籠罩、操弄，如同過去黨國媒體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代所做的。

- 官公署教育處。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b）。《中等學校暫用中國歷史課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c）。《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 《自由時報》（1997a）。〈以台灣為適用範圍的新憲體已經誕生〉（7月20日社論），收入《台灣的願景---自由時報社論選輯》（以下簡稱《台灣的願景》）頁249-250。
- 《自由時報》（1997b）。〈台灣又跨出歷史新的一步---並呼籲對凍省後的善後工作作妥善規劃〉（7月17日社論），收入《台灣的願景》頁251-252。
- 《自由時報》（1998）。〈民主政治對抗民族主義應是兩岸談判的準則〉（10月13日社論），收入《台灣的願景》頁33-34。
- 《自由時報》（1999）。〈對「新台灣人」的新詮釋〉（5月8日社論），收入《台灣的願景》頁149-150。
- 《自由時報》（1999a）。〈附錄〉，《台灣的願景》。
-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 朱宏源（1995）。《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 朱西甯（1977）。〈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仙人掌》第二期（4月1日）。
- 余光中（1997）。〈狼來了〉，《聯合報》副刊，8月20日。
- 沈松僑（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
- 李文絢（1999）。《報章血痕---中國新聞史上被殘殺的報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守孔（1994[1984]）。〈中國國民黨改造之意義與價值〉，《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五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何義麟（2005）。〈媒介真實與歷史想像---解讀1950年代台灣地方報紙〉，《台灣史料研究》第24期。
- 何義麟（2005a）。〈戰後初期台灣日文報刊的流通與管制〉，東海大學「『日本語』在台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研討會」論文表。
- 何義麟（2007[2006]）。〈「國語」轉換過程中台灣人族群特質之政治化〉，《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台北：稻鄉。
- 何義麟（2007a[2006]）。〈戰後台灣知識分子的日本觀〉，《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台北：稻鄉。
- 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原書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 吳廷俊（2004）。〈張季鸞和他的時事評論〉，《大公報百年史》，北京：中國人民

- 大學出版社。頁 261-274。
- 吳濁流（1988）。《無花果》，台北：前衛。
- 吳文星（1996）。〈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認識台灣歷史論文集》。國立台灣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編。
- 吳濁流（1977）。〈黎明前的台灣〉，《吳濁流作品集 5：黎明前的台灣》（張良澤編）。台北：遠行。
- 林果顯（2005）。《「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台北：稻鄉。
- 林麗雲（2000）。〈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台灣產業研究》第三期，頁 89-148。
- 林富美（1998）。《臺灣政經系絡中的報業發展：以聯合報為例，探討媒介雙元特質對報業組織作為的影響》，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明德、黃福慶譯（1982）。《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時報。（原作者小野川秀美[1969]）。
- 林世民（1983）。〈龍沒有穿衣服〉，《前進》第 12 期。
- 卓南生（1998）。《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台北：正中。
- 邱家宜（2011）。《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邱家宜（2012）。〈從《報學》看 1950 年代台灣的「反攻大陸新聞學」〉，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2012 國際新聞史學術研討會：新聞、新聞人與媒介技術的歷史脈絡」論文發表。
- 邱家宜（2013）。《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發表。
- 邱家宜（2013）。〈失落的世代：以吳濁流為例看戰後初期的台灣本土報人〉，《中華傳播學刊》第二十三期，頁 229-266。
- 周佳榮（2005）。《蘇報及蘇報案---1903 年上海新聞事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周婉窈（1989）。《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晚報。
- 周婉窈（2009 [1995]）。〈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海行兮的年代》，頁 77-126。台北：允晨。
- 周婉窈（2009a[1990]）。〈日治末期「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及其時代背景〉，《海行兮的年代》，頁 1-12。台北：允晨。
- 周婉窈（2009b[1991]）。〈「沙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海行兮的年代》，頁 13-31。台北：允晨。
- 洪儀真（1997）。《三 0 年代和七 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左翼思想及其背景之比較》。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正鋒（編）（1995）。《民族認同與台灣獨立》。台北：前衛。
- 施正鋒（2003）。《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

- 秦孝儀（1988）。《先總統蔣公對國父思想之實踐篤行與融會貫通》。國民黨黨史會。
- 荊溪人（1951）。〈宣傳技術在報紙上的運用---兼論現階段新聞宣傳政策的檢討〉，《報學》一卷一期。
- 雪琳（2000）。〈政治人物錯誤的示範〉，《自由時報》1月22日15版。收入葉春嬌（2010），《國族認同的轉折---台灣民眾與菁英的敘事》。台北：稻鄉。
- 張洋培（2006）。〈英國的官方國家認同---早期「帝國主義認同」之發軔與建構〉，收入《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施正鋒編）。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張良澤（1988）。〈《無花果》解析—從《無花果》看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吳濁流（著）《無花果》，頁7-32。台北市：前衛。
- 張季鸞（1979）。《季鸞文存》。台北：台灣新生報。
- 陳思[仁]等譯（2002）。《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原書 Hobsbawrn, Eric & Terence Ranger (ed.)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 陳三井（1994[1986]）。〈中國國民黨民國三十九年之改造與台灣新政〉，《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陳芳明（2003）。〈尋找謝雪紅的蹤跡〉，《陳芳明精選集》頁145-158。台北：九歌。
- 陳聖士（1989[1966]）。〈漢代邸報至清末官報〉，《中國新聞史》（曾虛白編），頁61-124。台北：三民。
- 陳紀滢（1977）。《文藝運動二十五年》。台北：重光文藝出版社。
- 陳映真（1976）。〈孤兒的歷史和歷史的孤兒〉，《台灣文藝》第53期「吳濁流紀念專輯」。
- 陳映真（1977）。〈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頁45-60。台北市：遠行。
- 陳映真（1983）。〈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前進》第12期。
- 陳映真（1983a）。〈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前進》第14期。
- 陳映真、戴國輝（葉芸芸整理）（1984）。〈「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的虛相與真相〉，《夏潮論壇》第12、13期。
- 陳元（1983）。〈「中國結」與「台灣結」〉，《前進》第13期。
- 許雪姬（1991）。〈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二十九卷第四期。
- 尉天驄（1980[1978]）。《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
- 曾虛白（1966）。《中國新聞史》（上）。台北：政大新聞研究所。
- 曾虛白（1982）。〈申論三民主義新聞政策〉，《迎曦集》。台北：時報。
- 葉明勳（1995）。《感懷集》。台北市：躍昇。
- 葉榮鐘（1985）。《台灣人物群像》。台北市：帕米爾。
- 葉榮鐘（與蔡培火等）（1987）。《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
- 葉石濤（1990）。《走向台灣文學》。台北市：自立晚報。

- 彭琳淞 (2004)。〈黨外雜誌與台灣民主運動〉，《20 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693-782。台北市：國史館。
- 彭瑞金 (1993)。〈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7-78。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彭瑞金 (1991)。《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
- 彭 歌 (1977)。〈不談人性，何有文學〉，聯合報副刊，8 月 17-19 日。
- 管中祥、劉昌德 (2000)。〈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台灣史料研究》一卷 16 期，頁 23-54。
- 蔡義敏 (1983)。〈試論陳映真的「中國結」〉，《前進》第 13 期。
- 蔡明璋譯 (1990)。《派森思》，台北：桂冠。(原書 Hamilton, Peter[1983]. *Talcott Parsons*. Ellis Horwood.
- 蔣中正 (1997[1966])。〈國父一百晉一誕辰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論叢》。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蔣中正 (1967)。《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增錄於《三民主義》。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蔣中正 (1969)。〈國父一百晉一誕辰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收入《中華文化復興論叢》，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蔣中正 (1975[1969])。〈新聞工作是教育事業〉，《總統 蔣公對新聞事業之訓示》，台北：中國新聞學會。
- 鄭欽仁 (1992)。〈唯有國家先定位才能確立大陸政策〉，《自由時報》，7 月 23 日。收入施正鋒 (編)《民族認同與台灣獨立》(1995)，頁 65-68，台北：前衛。
- 鄭牧心 (1987)。《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賴光臨 (1980)。《梁啟超與近代報業》。台北：商務。
- 盧建榮 (1999)。《分裂的國族認同》。臺北：麥田。
- 《聯合報》(2011)。〈代序：從漂流到尋岸---二十年兩岸棋局的「覆盤」〉，《從漂流到尋岸---聯合報兩岸議題社論選集》(以下簡稱《社論選集》)，台北：聯合報。
- 《聯合報》(1997)。〈筷子理論：台灣是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梁〉(10 月 22 日社論)，收入《社論選集》頁 54-57。
- 《聯合報》(2009)。〈兩岸關係：杯子理論與屋頂理論〉(10 月 20 日社論)，收入《社論選集》頁 216-218。
- 《聯合報》(2000)。〈屋頂理論：錢其琛的「新三句話」〉(8 月 28 日社論)，收入《社論選集》頁 78-81。
- 鍾肇政 (1987)。〈拼命文章不足誇—紀念吳濁流先生逝世十週年〉，吳濁流 (著)《台灣連翹》，頁 1-5。台北市：年代文庫。
- 鍾肇政 (1976)。〈以殖民地文學眼光看吳濁流文學〉，《夏潮》一卷九期，頁 63-66。
- 戴寶村 (1988)。〈國民小學社會科台灣史教材之檢討〉，《台灣風物》36 卷 2 期，

頁 33-49。

蕭阿勤 (2012)。《重構台灣》。台北：聯經。

Anderson, Benedict (1983) .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Colley, Linda (2003[1992]) . *Briton: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ondon: Primlico.

Eric (1990)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rner, Daniel (1963[1958]) .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Free Press

Schramm, Wilbur (1964) .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Stanford University.

Weber, Eugen(1976).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